

詹福瑞 主编

【中国古代文人心灵史丛书】

清 代

无奈的追寻

文人心理透视

韩进廉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金花

任文京

装帧设计:张志伟

责任印制:蔡进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奈的追寻:清代文人心理透视/韩进廉著.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 8

(中国古代文人心灵史丛书)

ISBN 7-81028-756-7

I. 无... II. 韩...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清代②知识分子—人物研究—中国—清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6701 号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合作路 88 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规格:1/32(880mm×1230mm)

印张:12.375

字数:286 千字

印数:1~5000 册

版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1 年 9 月第 1 次

ISBN 7-81028-756-7/I·134

定价:17.00 元

前 言

詹 福 瑞

近年来，古典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出现了许多令人欣喜的现象，由以往单纯的价值判断转向关注作家的情感和心灵世界即是其中之一。文学作品是作家特定时代的心灵标本，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折光。真正的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和人生苦难，也来源于作家的的心灵和情感。因此，文学史不仅仅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也应当是作家的心灵史和情感史。这正如丹麦文学史家勃兰戴斯所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它研究人类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

任何作家都生活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中。社会现实塑造了作家的态度，并由此形成作家的不同个性和作品的多样性。我们既不能根据现代人的需要主观地给古人贴标签，也不能用我们今天的情感和心态单方面去解释古代作家作品，而应去除思维的羁绊，探寻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作家的不同心态以及这种心态是如何通过作品反映的，哪些反映出来了，哪些深含不露

需要我们去领悟。俯视古人或仰视古人，远视古人或近视古人，都不能准确透彻地解读其作品，洞察其内心世界。优秀作品都是用心写成的，我们也应该用心灵去谛听，而心灵的交流则拒绝功利主义和浮躁心态。

文学作品反映了作家的心路历程。作家情感的细腻与粗犷，心灵的崇高与卑微，都可在作品中找到答案。文学创作是关乎心灵的事情，一旦看不到作品中的心灵世界，其感染力便可想而知。“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文学作品就是文人心灵世界的凝聚物。读者通过作品受到情的感染和激发，最终使心灵受到震撼，古人的心灵即与我们的心灵遥相呼应。千百年来，我们吟诵着他们的作品，诗文名篇早已烂熟于胸，可是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谛听，仍然会被无穷的魅力所吸引，被巨大的情感力量所俘获。文学的本质在于心灵由此得到了有力印证。

古代文人的作品展示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古代文人的人生大多呈悲剧性色彩，他们的情感受到磨难，心灵受到戕害，但他们始终呼唤着正义、善良和真情，当然，他们也有违心之作，然而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责任和精神追求。他们守护着灵魂，担荷着使命，在迷茫的路途上不知疲倦地跋涉着，穿过历史的隧道，直抵我们的心灵深处。他们写下作品不是为了生前的功利，也未必是想流传久远而不朽，可他们的心路历程和情感轨迹却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他们那悲天悯人的良知和深刻博爱的心灵令我们肃然起敬。

古代文人及其作品属于历史范畴，用历史的观点去思考，是理性的，当我们用心灵去感受并将其转化为情感时，那便具有深沉的历史感了。用心灵去感受作家作品，我们应该具备宽广的胸怀，细腻的情感，深邃的眼光。我们对一切作家及其作品都应给予尊重和关爱。古典文学研究是科学，它需要冷静的理性思考。但是，热烈的激情和心灵的渴望同样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条件之一。因为作品的创造者和阅读者都是活生生的人。我们应该对其给予心灵解读，而非套用公式做模式解答。

欲了解一代文学，需要先明了一代文人之心态，在同一时代或同一时期，作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大体相同，可是却最终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作品。这其中有诸多因素，最深层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作家心灵或心态的差别。因为文学作品是情感的产物，心灵的投影。多年来我们把注意点过多地放在历史社会等方面，而忽略了对文人心灵的开掘，忽视了与文人心灵的沟通交流，例如对孔子苦闷的内心独白和庄子吹出的自然箫声，对汉朝盛世文人被扭曲的痛苦心灵，对唐朝歌者心底永存不涸的辛酸泪水，对宋代词人心灵承受的巨大压抑，对元朝文人看似潇洒实则苍凉无奈的心境等等，我们投入的情感不够充沛，理解得不透彻，体察得不到位。

基于上述思考，我们于1998年开始启动这套《中国古代文人心灵史丛书》，经过三年的努力，这项跨世

纪的工作今天终于划上了句号。在丛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力求摒弃传统的垄断式话语模式，不追求所谓的“以文载道”。当然，在生活情境等方面，历史与现实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尤其是在一个功利和噪杂交织的时代，要想与古人进行心灵对话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我们对历史、人生和文学的思考达到了什么程度，也就决定了我们与古人心灵对话会达到什么程度。毫无疑问，我们注重的应是心灵关怀，情感交融，而绝不是冰冷的审视和理性的拷问。

这套丛书以学术为根基，以人物为中心，以展示文人的心灵世界和情感经历为主旨，将文学、历史、思想、文化溶于一体，或通过作品对他们进行心灵透视，或穿透时代风雨，摄下他们跋涉的身影，以期给读者提供一个了解古代文人及其作品的新视角。当然，尽管我们做出了很大努力，仍然会存在种种不足，希望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引 言

春兰秋菊，夏雨冬雪。历史的四季似乎在改朝换代中循环。其实，它是在螺旋式地延伸，而不是也不可能简单地重复。

中国的历史从远古走来，到明清之际，从“地球村”进化的步履看，应该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春天，然而降临华夏大地的依然是大雪纷飞的冬天。回顾明清易代前夕的晚明社会，一批有识之士敏锐地感受着时代的脉搏，从维护儒学“道统”和封建“正统”的观念中解脱出来，从陈旧的价值体系的束缚下解脱出来，走向自我体认，走向个性解放。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这股个性主义思潮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引起社会变革的地步，在封建统治力量的压迫下，不少人在无奈中走向疏离“道统”、疏离“正统”、追求自我赏识的道路。而整个社会，在商业经济的冲击下，贪欲滋长、奢侈风行、政治腐败，以道德信条为基础的国家统治机器迅速地显出了它的脆弱性。

于是，延续了大约二百八十年左右的朱明王朝正处于苟延残喘、朝不虑夕之际，在满洲军事力量和各地农民起义的双重压迫下，即刻濒于“忽喇喇似大厦倾”的绝境。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接着，清军在明朝降将吴

三桂的协助下，击溃李自成军，占领北京，揭开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的帷幕。

在清初的一二十年中，民族矛盾依然十分尖锐，由汉族士大夫所发动的反清武装斗争和清政权对这种反抗的镇压，一度进行得非常酷烈。直到康熙初年，汉民族的抗清活动才逐渐消歇，清王朝也逐渐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它稳固的统治地位。

清初学者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带着“遗民”心态，将亡国的绝望化为理性的思考，以“经世致用”的学风对封建文化加以剖视和清理。他们所怀抱的“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热望并没有消融封建文化的冰川。他们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祭起传统文化的大旗，把恢复旧道德、旧秩序视为团结人心、挽救危亡的灵丹妙药。不料，从这里出发，他们却不自觉地同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清政权走到了一起。

原来，清政权入关前，汉化程度就比较高，入关后很快就适应了中原地区的政治模式和文化心理。为了强化君主专制政体，清政权统治集团迅速地清除了残留的部落军事联盟的遗迹。他们在实行武装镇压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一方面，为了获得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也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努力发扬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巩固专制制度的内容，加强对读书人和普通民众的奴化熏陶。他们尤其看中了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称赞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开愚昧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他们不仅认识到朱熹思想包含着更多的有利于维护宗法秩序的价值，同时也期望通过绝对权威的树立，取消世人——特别是文人独立思考的权利。

这样，在康熙年间就出现了程朱理学的短暂再兴。在这股风潮中，一批文人如孙奇逢、汤斌、陆龙其、李光地、魏象

枢、魏裔介、熊赐履、张伯行……都因为研习和宣扬程朱理学，成为备受康熙帝青睐而官居尚书、大学士要职的“理学名臣”。

相反，对于具有“异端”思想——尤其是反清意识的文人，则以“文字狱”残酷镇压，打击他们的民族意识，取缔他们的人格尊严。同时，又以八股取士、博学鸿词作为诱饵，笼络文人成为驯服工具。作为重视学术、优容文人的表示，清政权还组织了大规模的书籍编纂工程。这类工程，固然有文化总结的意义，但其初衷主要是为了羁縻文人，炫耀“文治”。

清统治者以其精心编织起来的文网牢笼文人，致使文人自由思想的空间越来越狭窄。清统治者因势利导，钻“故纸堆”的考据风日益兴盛。从乾隆中期至嘉庆年间，号称“乾嘉汉学”的考据学达到鼎盛阶段。不可否认，考据学在文献整理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获得了堪称“辉煌”的成果，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就需要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观照。毫无疑问，考据风是由文化专制政策引出来的结果。许多杰出的才智之士在功名利禄和“文字狱”的挤压下，以毕生精力训诂考据，而无视科技的进步，纵然成就“辉煌”，甚至涌现出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王引之、钱大昕等一批“汉学大师”，但他们的成就就是以放弃“经时济世”的宏愿和热忱，牺牲对社会和人生的批判性思考作为代价的。特别是放在封建制度处于“末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社会“转型”期来观照，这种代价就显得格外巨大而沉重。

这出悲喜剧的上演，既包含着清政权的悲哀，也包含着“汉学大师”的无奈。

嘉庆、道光之际，封建政治的腐败使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新旧思想的斗争也愈益激烈。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龚自珍以

傲岸的姿态发出了极具穿透力和震撼力的声音：“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他对社会弊病的揭露，对社会危机的思考，主要集中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士林中普遍性的精神萎靡和人格堕落。他认为，社会发展的前提是个性的解放、人格的完善。

从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到宣统三年（1910）的辛亥革命，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在这 70 年间，封闭的中国被迫向世界开放，中国人开始从正面接触西方的“文明”。对中国的知识界来说，这种“文明”无疑是新颖的、先进的，但是否接纳这种“文明”，由于殖民主义的欺凌和民族耻辱感的伴随，又显得犹豫而迟疑。在激烈的争论中，小心翼翼地迈出了接纳的步履。

起初，被誉为首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先驱者，认为只须“师夷之长技”，招“西洋工匠”和“西洋舵师”，选精工巧匠认真学习，就可以达到“强国”的目的。即使如此，也遭到顽固不化的保守派的抵制和攻击。

接着，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西方文化的传播，以曾国藩、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敏锐地感觉到，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是不同质的东西，西方除了科技，还有他们自成体系的文化，中国人应该在保存旧有文化传统、维护传统“纲常名教”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

同时，西方的进化论观点和民主、民权思想也为更多的文人所接受。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倡言“革命”的理论空前高涨。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秋瑾等，为鼓吹“革命”，遭到清廷的通缉、逮捕，甚至献出了自己火热的青春和宝贵的生命。

有清一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中外矛盾，相互交

织，不断激化。这个王朝，自始至终，都是用血与火——刀与剑——枪与炮的语言书写在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交织在知识分子心灵中长达两个半世纪，使绝大多数文人的命运与清代文运一样，充满了悲剧的深刻与冲突。有人说：“清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晚清之学新。”但是，无论是清初恢宏博大的“实学”复兴，还是乾嘉时期谨严精密的“朴学”鼎盛，抑或晚清更法改制的“新学”崛起，在不同的学术思潮中，深藏着一个共同的悲剧灵魂——在文化专制主义的高压下，无奈地追寻，无奈地考据，无奈地抗争。

追寻的无奈，考据的无奈，抗争的无奈，难道无奈是历史给以有清一代知识阶层的宿命？

历史用事实向人们证实：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开始形成的那天起，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一直成为统治者的附庸，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群体。因此，作为时代的神经，他们能够敏锐地感受，却不能有效地反馈；作为社会的喉舌，他们被允许“主文而谏”，却不能摇旗呐喊；作为历史变迁的预言家，他们只能作出判断，却无力付诸实践。尤其是在封建“末世”，作为社会变革的先知，他们要揭露现存秩序的弊窳，预言光明的未来世界，必须承受时代落差的重负。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就在于他们在无数兴亡盛衰、无数深重苦难中培养出一种非常宝贵的道德情操——“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驱动他们忘却了自己的依附身份，以自己相对独立的思想意识，在被动和能动中艰难地从事思想、文化、学术的研究和创造，或者有限地参与政治活动。

因此，他们只能在文化专制的高压下，无奈地追寻，无奈地考据，无奈地抗争。

目 录

前言	(1)
引言	(1)
一、十字路口的抉择	(1)
生死荣辱：“贰臣”的尴尬	(3)
“遗民”的追寻与抗争	(15)
在无奈中“回归”传统	(36)
文字狱：士人难逃的劫数	(53)
二、回光返照的辉煌	(63)
理学再兴与古文崛起的语境	(64)
颜李学派：一块苏醒的盆地	(79)
从《四库全书》看“盛世”文治	(87)
登上文学巅峰瞭望人生	(100)
命运的悲剧与悲剧的辉煌	(129)
三、悲壮的生命挣扎	(144)
在历史沉积中附丽人生	(146)
汉学壁垒的建构与倾斜	(155)
在“故纸堆”上俯瞰尘嚣	(168)
经学朝着“合于世用”推进	(188)

诗界各派论争的弦外之音·····	(204)
小说家的“白日梦”·····	(233)
扬州八怪：燃烧的傲骨·····	(256)
四、渴望晨曦的呐喊·····	(278)
常州学派：惊涛骇浪中的自救之舟·····	(280)
身处“衰世”的幽怨与呼唤·····	(287)
洋务派的沉思与抉择·····	(309)
变法维新：改良派的梦幻·····	(323)
迎着晨曦奋起革命·····	(347)
尾声·····	(377)

一、十字路口的抉择

公元1644年：明思宗崇祯十七年，清世祖顺治元年。

这一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疑。三天刮风，两天下雨，吞吞吐吐，犹犹豫豫，气候刚刚暖和了几天，大地吐露了一些幼小的绿芽，却又变冷了。于是，希望与绝望，生存与死亡，趋于垂暮的寒流和初来乍到的热力重新展开殊死的搏斗。

朱明王朝的国都北京，从宫廷到市井，人们惊慌地传递着李闯王的消息：李闯王在西安称帝，建立了“大顺”政权；李闯王进军山西，攻占了太原；总兵周遇吉据宁武关顽抗死难；大同，宣府，居庸关，驻军接连投降……

三月十七日，李闯王在京城四郊安营扎寨，四通八达的京城成了一座孤城。一队一队的兵丁在大街小巷来回穿梭，谁也说不清他们是在集结还是奔命。骑马乘轿的缙绅大僚和扶老携幼的平民百姓，都像没头苍蝇似的忽而朝南，忽而向北，谁也说不清哪里是安全的避风港。慌乱的人流，听到从远郊传来的沉闷的炮声，虽然顷刻间就消失在阴郁的天空，都好像在他们身边爆炸似的，惊惧得不知所措。

十九日凌晨，穷途末路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亲自撞钟召集百官商议对策，却没有一个人前来朝见。他绝望地仰天长叹，清

醒地意识到，自己撞响的是大明帝国灭亡的丧钟。他踉跄地登上皇宫后面的煤山，怀着悲凉和遗恨，一步挨一步地走到寿皇亭前，就在老槐树下投缢自缢，告别了阴郁的故国江山。

据说崇祯帝临死时左足跣、右朱履，披头散发，一身白衣，衣襟上写有15个字：“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他把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大明皇朝的灭亡归咎于“诸臣”。其实，朱明王朝身患绝症以至死亡，是日久天长各种积弊的必然结局。从明中叶到明末，一百多年来，极端腐败的统治集团，早已把大明帝国的肌体摧残得百孔千疮。它的臣民被逼得无法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举起反叛的大旗。李自成颁布的起义檄文就说：“贿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公侯皆食肉纨绔，而恃为腹心；宦官悉龀糖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思；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就在崇祯帝自缢煤山的这一天，李自成把“大顺”的旗帜插上北京城头。然而，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并没有使他的“大顺”政权拉开中国历史上李家王朝的序幕，却为身染沉疴的封建“末世”平添了许多并发症。兴起于东北的后金政权，早就在山海关一带对朱明王朝形成巨大的威胁。当李自成的农民军推翻了明政权之后，汉族地主官僚和满洲贵族勾结起来，共同抵抗李自成农民军。于是，义军败亡，清兵入关，清世祖福临到北京加冕登基。激烈动荡的时代大波，促使社会矛盾似乎在骤然之间发生巨变：阶级矛盾暂时缓和，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逼迫着生存在满目疮痍的中原大地的每个阶层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光荣与耻辱、生存与死亡的考验，做出“做什么人，走什么路”的抉择。

生死荣辱：“贰臣”的尴尬

满族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要取得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政权，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为此，他们确立了笼络和利用汉族降官降将的策略。早在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就对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等文士降官和李永芳、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武人降将加以重用。入关后，满洲贵族更将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有效地笼络了朱明王朝的一大批文臣武将。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如同明清之际改朝换代，江山易主，君主专制沿袭不变，既频繁变换，又绵延不绝，构成一道光怪陆离的风景区。围绕着政权的更替，既有无数为拯救前朝危亡而英勇捐躯的“忠臣”和“江山换稿”后矢志不移的“遗民”，也有视生命财产比气节更为重要而投降变节事奉新朝的“贰臣”。在他们身上折射着中国文化传统中如何做人的价值取向。

“杀身成仁”的传统儒家伦理观念，固然令人企慕，但在生命财产的考验面前，从来就不是百分之百地为世人所信仰和践履。特别是满清王朝以“复君父仇”为号召，把明朝文臣武将的仇恨转移到李自成身上以后，屈辱的投降可以变得“合情合理”，可耻的变节可以成为“兼事二主、不辱故主”的堂而皇之的行动。在这层虚伪外衣的掩饰下，自身的生命财产可以保全，昔日的荣华富贵可以延续。洪承畴就是一个典范。据《清史稿·洪承畴传》载，这位进士出身，官至太子少保、兵部

尚书的明廷大员，抗清兵败被俘之后，皇太极让降臣范文程去劝降，——

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今古事。梁间尘偶落，著承畴衣，承畴拂去之。文程遽归，告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之，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赉无算，置酒陈百戏。

有的人对“上大悦”很不理解。皇太极说：“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历史证明：没有投降派，清政权不可能在短期内打败李自成，统一全中国。

清兵入关后，一方面对抗清势力大肆镇压，一方面继续采取劝降政策，礼葬崇祯皇帝，广泛招徕明朝官吏，下令“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即使“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这项政策的出台，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原明朝大学士冯铨因谄事魏忠贤而声名狼藉，降清后仍以大学士衔入内院佐理机务。

原东林党人陈名夏，为多尔袞器重，就任礼部尚书、弘文院大学士。

“东林巨子”钱谦益降清前后的种种表演，更加微妙地表现出明清之际一些文士人生态度的复杂情态。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年自号蒙叟、东涧遗老。常熟（今属江苏省）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侍郎，曾讲学于东林书院，为当时清